

# 社会成就归因认知与社会公平探析

郭砚君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保持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及发展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与支持,社会阶层的有序流动、民众对社会公平的认可是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基石。以归因理论为视角,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寻社会成员的社会成就归因认知,推测社会群体对社会公平状况的主观判断,总结并讨论当代中国社会成就归因认知的特点,推断并分析社会成就归因认知所折射的中国社会公平现状。

[关键词]归因理论;社会成就归因认知;社会公平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3)02-0147-08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中国社会的变迁,从客观上解析,体现于社会结构、社会设置、社会分层等方面的改变,市场主导取代了计划指令;从主观上解析,体现于民众的社会认知、思想意识、思维方式等方面的转变,多元的价值取向冲击着传统的价值观念。从社会学视角分析,欲继续保持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及发展,需要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与支持,社会阶层的有序流动,民众对社会公平的认可是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基石。人在持续地社会化过程中,随着对社会及周围环境认知的不断加深会形成一套带有主观色彩的社会评价体系。社会地位的获得条件及途径是衡量社会公平的重要指标,社会地位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的位置<sup>[1] P.107</sup>,而社会地位的获得则是个人获得一种特殊的、社会的、职业上的、声望的,并与收入相关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过程和机制。研究显示:在中国,1978年以前个人获得社会地位主要是依靠家庭的政治背景,没有代际传递的特征,而在1978年以后不论是个人社会地

位的获得还是教育机会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经济基础以及社会关系网络。

诸多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家庭收入较多,生活环境较好的个人在教育获得上会比他人拥有更多的优越条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更大;而社会地位较低的个人总是和家庭背景处于弱势地位有一定的联系。中国社会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丰富物质解决了民众的衣食之忧,但在社会资源分配上缺乏有效机制与政策的调控使贫富差距急速拉大,社会阶层的差距愈发明显,社会流动的通道愈发堵塞,社会地位的传递愈发固化。社会是属于封闭型社会还是开放型社会,取决于其社会群体在获得社会地位所用的资源是依靠家庭背景提供还是依靠个人自身素质提供。而任何社会、国家在任何具体历史时间点上,都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或是完全开放的两极,只可能介于两极之间的某一点上。这也意味着没有一个社会、国家是完全公平的,真正的公平是给人们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设立平等的竞争程序,不公平实质上是一种直接与人们社会地位差异相关联的利益和特权的分配不平等。

社会公平是人们对社会环境的主观判断,对社

[收稿日期]2012-09-20

[作者简介]郭砚君,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会运行认可与否的主观反应,无法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需要通过可观察或可测量的指标间接得知。社会成就归因是社会大众对社会成员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取得成就的途径或方法的倾向性认知与解释<sup>[2]</sup>。民众对社会成就归因的认知实质上是对社会开放水平、公平程度的主观反应,对其进行了解和分析有助于我们及时发现症结所在,增强社会公众的积极性和满足感,保持社会的整体活力。

## 二、理论视角与文献回顾

### (一) 归因理论视角

归因理论是西方社会认知领域最为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自创立以来一直受到各领域学者的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末归因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后,一直作为一个理论热点受到教育学、医学、管理学及心理学研究者的青睐。

归因理论是对人的行为结果做原因推论的一个研究领域,主要研究人是怎样和用何种方式理解、解释其行为原因的过程。归因理论着重于以原因推论的信息,并在理解这些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预测和控制随后的相关行为。归因理论的关键是把人的知、情、意、行等活动统一起来,人们对结果的不同归因,会产生不同的情感反应和期望水平,继而引起行为的变化<sup>[3]</sup>。归因理论从认知观点出发,提出了人对外界刺激反应的心理内过程与行为外表现的能动因果关系模式,探究社会成员对社会的认知与看法。理想的归因模式是将成功归为能力强和努力的结果,将失败归为没有付出努力。

### (二) 文献回顾

海德首先把归因问题理论化。他假定所有人类都有两个很强的动机:对自己周围世界建立连贯一致的理解的需要;控制自己环境的需要。其归因理论认为,我们在寻找他人行为的原因时,试图根据归因于行为者的内部或归因于行为者的外部来回答这个问题,即单维度归因模式。外部的归因即环境因素,内部的归因主要包括个人的能力和努力。海德的归因理论是一项创造性的工程,他对行为原因所做的个人与环境的划分一直都是归因的基础,但对内部、外部归因的深层原因,海德并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详细说明。从海德的理论中可发现最优归因模型的雏形。外在归因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人们对社会环境不可控的恐惧心

理,很大程度上这种恐惧心理是害怕面对失败而造成的;相反,对于内在归因的意识是相信自己对事件的成功与否有充分把握,将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可控因素,使个体更自信,正视成功和失败。

在海德的开创与推动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造就了归因理论研究的鼎盛时期。1965年,琼斯和戴维斯提出了“对应推断理论”,扩充和发展了海德的归因理论,其理论依据是,人类行为常常由对于能动者稳定的、相对不变的处事方式来解释。从社会学角度解释,是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某些具有相似性的事务形成的特定的处理方式,这些方式一方面受到以往经验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也等同于舒茨在现象学社会学中提及的“类型化”概念。所谓“对应推断理论”指外显行为是由行动者内在的人格特质直接引起的,即人的行为与其人格特质一致。“对应推断理论”解释个体出现不同归因的原因,但个体归因情况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对干扰因素的分析使后继学者将归因的经验研究结论升华为理论时提供了相应的准则,使后续的归因理论更具一般性和普适性。

凯利的三维理论是继“相应推断理论”之后对海德理论的再一次补充、扩展。凯利认为,人们在归因过程中总会涉及三方面的因素,即客观刺激物(存在)、行动者(人)、所处的关系或情景,其遵循协变性原则。凯利对归因理论的贡献在于提出对归因过程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关注人们究竟利用哪些信息做出归因,对人们的归因过程作了较细致、合理的分析和解释。美国心理学家罗特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内—外控制点理论”,研究控制倾向问题。罗特认为,某些人生活中多数事情的后果取决于从事这些事情时的努力程度,相信后果总体来说取决于在相关事情上的投入,相信可以控制事情的发展与后果,这一类人的控制点在内部称为内控者。控制点理论研究的目的除了为各种不同的行为及其结果找到两种不同的归因倾向外,还在于察觉到控制点的类别及两种不同控制点的意义和价值。至此,归因理论较开创初期更加完善,将个体的归因特性考虑周全以外,总结出内归因与外归因的模式,但未对内归因与外归因作出评价。

归因理论研究的发展使其视野及涉猎范围不断扩大,并逐渐形成了主导归因研究方向的新领域——成就归因研究。其领军人物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韦纳。韦纳的主要研究点有三个:成败归因

的原因、维度及其对情绪和行为的影响;成就动机水平与成就归因;能力自我知觉水平与成就归因。韦纳的研究对象为学生群体,结论局限在教学情景中,反映的是西方社会的学生学业成就归因。其贡献不仅是开辟新的归因研究领域,也建立了归因的研究体系,将归因的分类总结为内外归因、稳定或不稳定归因,可控或不可控归因。

20世纪80年代末期归因理论被引入中国,许多学者积极实践国外归因理论研究的结论,并开始探究中国本土化的归因理论。国内归因理论的研究集中在教育领域,大多继承了韦纳的成就归因理论,将大量的实验和调查研究聚焦于学生的学业成就和动机,研究学生的学业成就归因及其影响因素。成就归因理论认为,在学业上,学生对成败持有的归因信念会影响学生的成就期待、情绪情感,继而影响成就表现。若把成功归结为能力、努力等因素,会提高学习满意感、自信和期待,促进学习动机,提高学习成绩;若把失败归结为能力不足,会降低期待,减弱学习动机。无论成就归因和学业成就之间是否存在中间变量或中间变量是什么,都已证实归因确实是影响学业成就的一个重要变量,而归因方式的不同会对学生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有些学者也探寻除学业成就归因之外的领域,以归因理论为基础,研究社会行为的归因以及人际交往的归因,逐渐增强了对社会群体归因模式的关注。

### (三) 概念界定

目前,对于社会成就的界定并无共识。有学者认为,成就可从多个维度进行理解,社会地位的提  
升、家庭生活幸福感的加强、经济效益的增长等。基于设计调查问卷的初衷,本研究中将社会成就界定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社会地位。社会地位在文中依据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型进行衡量,即判断社会地位的高低等级主要依据收入多少、学历高低以及职业划分的阶层地位来判断。

社会成就归因即社会成员对于自己获得社会地位的原因及所需条件的判断;社会成就归因认知即社会成员处于特定社会环境中,对社会群体获得社会地位的方式、渠道以及条件的评判,由此得到的主观倾向性和偏好性。

##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07年武汉大学社会发展

研究所受湖北省利川市政府资助完成的一项题为“利川民生与和谐社会发展战略研究”的研究项目,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一次以民生与和谐社会建设为主题的问卷调查。在利川市范围内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了1000位市民,最后确定的有效问卷为963份,问卷有效率为96.3%。

### (一) 研究假设

在社会分层问题的实证研究过程中,社会分层学家提出的操作性假设为: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等级有序的阶层结构中获得的社会位置,主要由阶级出身和家庭背景所决定,这个社会就是封闭型社会(或传统型社会);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阶层位置主要取决于自己后天的努力(如自己学习得到的受教育水平和技术技能等),这个社会就是开放型社会(或现代型社会)<sup>[4]</sup>。本文依据此操作性假设提出以下假设。

(1) 若社会群体将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归结为内在因素即个人努力奋斗、能力、文化程度等,表明人们在主观上肯定社会公平的状况,说明社会具有开放性特征。

(2) 若社会群体将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归结为外在因素即家庭背景或出身、社会关系网、家庭经济实力等,则表明社会公平状况欠佳,可推断社会具有封闭性特征。

### (二) 数据分析

样本构成情况如表1所示。

对社会成就归因认知的测量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成就因素重要性评分。调查问卷以家庭背景或出身、社会关系网、机会或运气、个人天赋与能力、个人努力奋斗、个人文化程度、个人政治身份、家庭经济实力以及父母受教育水平等9项指标测量社会成就归因认知。在调查中,要求受访者主观判断9项指标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评分,最重要的为10分,最不重要的为1分。

由表2可知,受访者认为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分别为社会关系网、个人努力奋斗和家庭经济实力。从九项指标得分的均值分析,集中在6~8分的区间内,最高与最低均分仅相差1.7分,说明受访者对成就因素重要性的评价未出现极大的差异,社会成员的主观评价具有趋同性。标准差集中在2.3~2.7分之间,说明社会成员对每项因素的评分差异不大,内部的一致性较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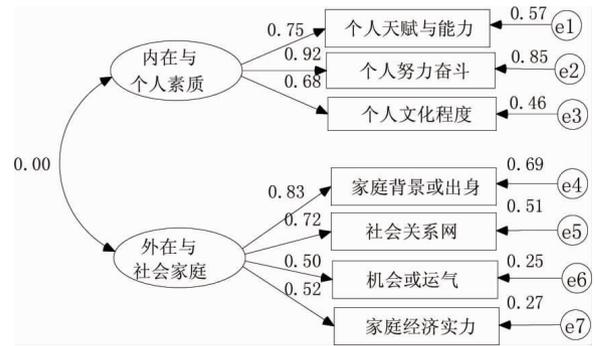
表 1 样本构成情况

自变量	类别	频次	百分比 (%)
性别 N = 952	男	561	58.9
	女	391	41.4
年龄 N = 954	18 岁以下	64	6.7
	18 ~ 35 岁	377	39.5
	36 ~ 45 岁	313	32.8
	46 ~ 55 岁	147	15.4
	56 岁以上	53	5.6
婚姻状况 N = 959	未婚	178	18.6
	已婚	773	80.6
	其他	8	0.8
受教育程度 N = 958	初等教育	293	30.6
	中等教育	290	30.3
	高等教育	375	39.1
职业类型 N = 940	党政群团机关干部	168	17.9
	工商企业管理人员	22	2.2
	科学技术人员	12	1.3
	教师	135	14.4
	医务人员	52	5.5
	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	44	4.7
	工人	82	8.7
	个体经营者	180	19.1
其他	245	26.1	
户口类型 N = 958	城市户口	633	66.1
	农村户口	325	33.9
家庭年收入 N = 957	低收入	743	77.2
	中等收入	178	18.8
	高收入	36	3.7

表 2 受访者对社会成就因素重要性的评价

成就因素	平均值	标准差
社会关系网	7.7996	2.3829
个人努力奋斗	7.6628	2.3519
家庭经济实力	7.2981	2.5592
家庭背景或出身	7.0471	2.8967
个人天赋与能力	7.0720	2.4267
个人文化程度	7.0535	2.3819
机会或运气	6.7481	2.4264
父母受教育水平	6.5970	2.7277
个人政治身份	6.2232	2.7073

二是社会成就归因认知的测量模型如下图所示。



依据修正后的社会成就归因认知测量模型及其关键系数可知,内在与个人素质和外在与社会家庭两个潜变量由 7 项指标组成。内在与个人素质变量由个人天赋与能力、个人努力奋斗、个人文化程度三个指标测量,其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75、0.92、0.68;外在与社会家庭变量由家庭背景或出身、社会关系网、机会或运气和家庭经济实力四个指标测量,其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83、0.72、0.50 和 0.52。

由表 3 可知,从模型的绝对适配度指数、增值适配度指数以及简约适配度指数判断:模型成立,适配度好,可接受社会成就归因认知的测量模型。两个潜变量的协方差为 0,说明其无共变关系。故在后续的分析中将自变量与此两个潜变量分别作多元回归模型比较分析。

三是多元回归模型的构建。从户口类型看,拥有城市户口的群体认为外在因素重要且回归系数较大,说明城市社会群体认为外在因素更为重要。户籍的二元制是中国特有的问题,户籍制度自产生的那天,就对农业户口群体的职业流动造成了负面影响。户籍制度所造成的社会隔离影响了人们的福利待遇,还严重影响人们初职地位的获得、教育资本的积累、现职地位的提升。从数据分析可知,户口类型的不同不会对社会成就造成影响,说明社会公平力度加大。近些年,中国城乡一体化建设在积极地落实中,能如此最大限度地破除二元体制的壁垒。

由表 4 数据可知,两个模型的 F 值通过检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成立,即内在与个人素质因子和外在家庭社会因子与自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从调整后的确定系数 R 平方值来看,模型 I 的 R

平方值为 0.495 模型 II 的 R 平方值为 0.743 ,回归 方程的消减误差比例较高。

表 3 模型适配度检验摘要表

统计检验量	适配的标准或临界值	检验结果数据	模型适配判断
绝对适配度指数			
$\chi^2$ 值	$p > 0.05$ (未达到显著水平)	10.675( $p = 0.099 > 0.05$ )	是
RMR 值	$< 0.05$	0.021	是
RMSEA 值	$< 0.08$ (若 $< 0.05$ 优良; $< 0.08$ 良好)	0.028	是
GFI 值	$> 0.90$ 以上	0.997	是
AGFI 值	$> 0.90$ 以上	0.985	是
增值适配度指数			
NFI 值	$> 0.90$ 以上	0.995	是
CFI 值	$> 0.90$ 以上	0.998	是
简约适配度指数			
$\chi^2 / df$	$< 2.00$	1.779	是

表 4 影响社会成就归因倾向的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 I 内在与个人素质			模型 II 外在与社会家庭		
	B	t	P	B	t	P
男性( a)	-0.387	-3.32	0.023	0.620	2.33	0.041
年龄	0.417	1.45	0.039	-0.559	-2.26	0.033
城市户口( b)	-0.031	-0.38	0.701	0.601	1.89	0.036
婚姻状况(参照组:未婚 1)						
已婚	-0.203	-2.15	0.032	0.206	2.35	0.019
其他	-0.190	-0.50	0.615	0.280	0.80	0.424
文化程度(参照组:中等教育)						
初等教育	-0.205	-2.34	0.020	-0.199	-2.07	0.038
高等教育	-0.145	-1.41	0.158	0.2662	0.405	0.016
职业(参照组:科学技术人员)						
党政群团机关干部	0.271	0.95	0.340	-0.048	-0.18	0.855
工商企业管理人员	0.4951	0.48	0.038	-0.3891	0.26	0.207
教师	0.2491	0.87	0.045	-0.039	-0.15	0.884
医务人员	0.432	1.42	0.155	0.068	0.24	0.809
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	0.277	0.89	0.371	-0.237	-0.83	0.408
工人	0.4491	0.50	0.034	-0.083	-0.30	0.764
个体经营者	0.4251	0.47	0.042	-0.017	-0.06	0.950
其他	0.4701	0.65	0.099	-0.092	-0.35	0.727
年总收入	0.440	2.56	0.011	0.067	0.42	0.672
Constant	7.138	35.727	0	6.585	33.590	0
Adjusted R Square	0.495			0.743		
F 值	2.657		0	4.376		0

注: a 参照组为女性; b 参照组为农村户口。

从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以及显著性检验看,可得出以下结论。

(1) 性别、年龄对内在个人素质因子和外在家

庭社会因子均有显著性影响,户口类型和外在与社会家庭因子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

从性别看,男性更多地把社会成就归结为外在

因素,而内在因素会降低社会成就归因的得分,对社会成就起到反作用。古今中外,人们始终认为男性不论在体力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优于女性,女性与生俱来的特质注定了其性别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兴盛以及社会学对女性主义的关注,女性地位不断提高,获得的机会和资源都不断增多,但与男性相比,女性是否真正享受到社会公平则需要我们深入探寻。

从年龄看,年龄越长者认为内在因素越重要,而外在因素的作用减少。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经验愈加丰富,对社会设置、社会制度和社会竞争的认识也越深刻,年龄角色与被承认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相关。李莱是年龄社会分层理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不同年龄段的人有不同的能力、取向和动机,他们对社会发展及其过程的贡献也不相同;年龄往往是人们进入和放弃某种社会角色的一个标准,它影响着人们的角色期待和角色认可;社会中存在着两个与年龄相关的过程:阵流和角色分配及社会化<sup>[5] (PP. 82~84)</sup>,即社会财富及荣誉的分配与年龄有着内在联系。年龄阶层具有与可承担的角色相关的不平等特征,人们由于年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角色期待、履行某种角色的能力期待和不同的报酬期待。一个人能占有的社会地位或角色都典型地具有年龄等级特征<sup>[5] (PP. 80~82)</sup>,通常认为青年人和老年人被许多职业或岗位所排斥,他们的归因本应倾向于外在因素,而在适宜工作年龄之内的人则倾向于内在归因。数据结论相反,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不会因年龄而阻碍社会地位的获得。

(2) 从婚姻状况的数据分析,已婚者和内在与个人素质因子、外在与社会家庭因子均存在显著性相关。从其相关系数得知,已婚者认为社会成就归因的内在因素与已婚状态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与外在因素存在正相关关系,故已婚者更倾向于将自己的成就归结为外在和家庭社会因素,内在与个人素质因素会阻碍个人的成就。

社会中各种制度的完善以及新事物的出现,人们对婚姻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现代社会中的人日趋现实和理性,选择结婚对象越来越倚重经济学思想,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中国社会亦是如此,婚姻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家庭需要、情感寄托,更多的是两个家庭社会关系的结合、融合以及扩张。

(3) 从受教育程度分析,模型 I 和模型 II 均显

示文化程度为初等者认为社会成就是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呈负相关关系,即受初级教育的群体认为自己的文化程度是造成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将社会成就归因于外在与社会家庭因子,与内在与个人素质因子无相关性,即高等学历群体认为取得社会成就更多取决于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质量、强弱等。

教育影响个人的价值观,从社会成就归因折射出高学历者和低学历者对社会公平以及获得成功渠道的认识和看法。一般认为学历越高的群体越应把社会成就归结为个人的努力和素质,而学历越低者则应把社会成就归结为外在条件,而数据显示学历越高的群体反而越倾向于外在归因。经比较分析,可认为对于内在因素(人力资本)和外在因素(社会资本)重要性的认知往往与自身的条件相反,即拥有社会资本的群体认为人力资本重要,而拥有人力资本的群体认为社会资本更为重要。

(4) 从职业变量分析,不同职业的群体认为社会成就只与内在与个人素质因子存在显著性相关,而与外在因子无关。模型 I 中,职业为工商企业管理人员、教师、工人和个体经营者的从业人员将社会成就归因为内在与个人素质因子;模型 II 中,不同职业群体都认为社会成就与外在与家庭社会因子不存在相关关系。

从陆学艺对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划分的研究结论来看,工商企业管理人员属于较高阶层,工人和个体经营者都处于相对弱势的情形,处于较低阶层的群体更大程度上将社会成就归结为内在因素。由于调查样本中职业类别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也可能造成分析误差。但总体上,各职业群体都倾向于将自己的社会成就归结为内在与个人素质,而把失利归结为外在因素。

(5) 从收入看,收入与内在与个人素质因子存在显著性相关,与外在家庭社会因子无相关关系;从其回归系数分析,年收入越高的群体越会将社会成就归因于内在因素。

巨大的贫富差距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紧张”是一种客观结构,使得发生社会矛盾有了重要的基础;但是,矛盾是否出现或是否激化,那还要看另一个环节,这就是“公正失衡”,“公正失衡”说的是一种民众的主观心态,也就是说,当贫富分化与“不公平”、“不公正”没有什么关联时,当人们认为贫富是一种合理的竞争结果时,它与社会冲突就没有

什么关系<sup>[6]</sup>。在收入问题上,理想的归因模式是收入的高低与个人的能力和素质相关,而与外在的社会环境无关,从数据得出的结论可以反映出公众认为中国社会的制度环境可以给与有能力者发挥才能的空间,未将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平联系在一起。

综上,模型 I 为:男性相对于女性,受初等教育群体相对于受中高等教育群体,未婚群体相对于已婚群体和其他婚姻状况群体,认为内在与个人素质因子对获得社会成就的影响作用较小;年龄越高者,收入越高者,从事工商企业管理、教师、工人以及个体经营职业群体相对于其他职业群体而言,认为内在与个人素质因子对社会成就的影响更大;模型常数项显著不为零。模型 II 为:男性相对于女性,城市户口群体相对于农村户口群体,已婚相对于未婚、其他婚姻状况群体,高等教育群体相对于初中等教育群体,认为外在与社会家庭因子对社会成就更有影响力,评价更高;而年龄越大者,初等教育群体相对于中高等教育群体对外在与家庭社会因子的重要性评价较低;模型常数通过显著性检验不为零。比较两个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总体上,社会群体认为内在因素的重要性高于外在因素。

从收入、职业和教育三个自变量来看,处于中层社会地位的群体倾向于将社会成就归结为内在与个人素质因素,而处于低层和高层社会地位的群体更倾向于将社会成就归结为外在与社会家庭因素;性别、年龄、户口类型等不同属性的群体在社会成就归因倾向上无差别,婚姻对社会成就归因有影响,即已婚者倾向外在归因,认知到家庭资源整合的重要性。

## 四、研究结论

### (一) 当代中国社会成就归因认知的特点

1. 内外成就归因因素重要性基本持平 归因的“取向”决定了归因的导向性。对于个体而言,如果将成功归结为内在的可控因素,将产生成功的自信,期望继续成功,并积极付出努力;如果将成功归于外在的不可控制因素,则一次成功不会增强其成功的自信心,对后继行为起不到促进作用。从表 2 的评分得知,社会群体对家庭经济实力、家庭背景或出生、个人天赋与能力以及个人文化程度重要性的认知均趋于一致,即先赋条件和后天获得对社

会成就同等重要。均衡的归因倾向反映出我国社会正朝向公平的状态运行。

中国传统社会,中国人把成就归结为“天命”,也就是那些外部的、不稳定的以及不可控制的因素;当代中国,公众认为社会成就既与内在、稳定因素、可控因素相关,也与外在、不稳定、不可控因素相关,两者旗鼓相当。虽然中国的情况已有较大改善,但仍然处于传统和现代,封闭和开放之间,怎样更好地解决教育不公平情况,发挥教育应具备的社会整合功能,建立畅通的社会流动机制推动社会公平的进程是需要继续努力探讨的方向。

### 2. 政治身份在社会成就归因中地位的减弱

个人政治身份重要性的得分最低,说明以政治面貌来决定个人命运的时代已经逝去。有研究显示,在解放初期党员更易于被提拔到较好的岗位,“文革”时期的政治挂帅政策,重出身、重立场、取消考试制度而落实推荐上学政策,解放军、工人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政策的执行等,使得“党员身份”所代表的政治资本保持着很重要的位置。

1978 年以后,虽然“党员身份”仍然显示着很重要的作用,但在干部队伍知识化、年轻化政策的影响下,那些是“党员”而又有知识的人就易于得到提拔,这表示教育资本开始显现更加重要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干部才通过各种培训渠道增加自己的人力资本。1992 年后,伴随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教育资本”的权重进一步加强,尤其是 20 世纪末期倡导的“知识经济”等,使得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在技术升级中更易于升迁到较高的工作岗位。<sup>[4]</sup>知识重要性的提高使我们明确,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改变当前的处境,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公平状况的改善。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开放,政治身份逐渐失去其影响力,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使得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加强。

(二) 由社会成就归因认知所折射出的中国社会公平现状

1. 对社会公平认知的趋同 传统性别上的歧视已逐渐离我们远去,成功的获得取决于个人的努力程度;城乡二元体制所带来的限制在减退,不同户口类型的群体对于社会成就归因认知并无明显差异。社会成员通过后天努力所获得的学历、技能、技术可作为实现社会流动的工具,达到自己在社会分层目标上的预期,脱离传统的以先赋身份作为社会分层的划分归属体系。公众在社会成就归

因认知上反映出,不同属性的群体对于中国社会公平状况的感受具有同质性,中国社会正朝着公平的方向稳步前进。

2. 开放与封闭共存 市场经济的实施,已打破传统计划经济所塑造的社会结构,也打破计划经济时代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向全民所有制性质与级别较高的企业单位流动的局面,在体制外开辟了新的流动渠道,使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有所提高。如今,对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不是通过国家安排工作,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决定自己的事业<sup>[7]</sup>。这些制度保障了社会成员正常有序流动的途径。

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层级化的社会,社会阶层的继承性与阶层间流动的封闭性是毋庸置疑的,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天,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虽有所提高,但各阶层的边界仍然存在且不易打破,一些阻碍社会成员正常流动的不合理机制需继续改进和重构,一些根深蒂固于人们观念中的不平等思想也需几代人的努力才会有所改善。只有打破制度与思想的双重歧视,中国社会才可能更加开放、更加公平。

诸多研究成果揭示,当今中国的社会流动是代际流动,形成“父荣子贵”的局面。对于改变自身命运的惟一公平的渠道——教育也越来越向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人倾斜。家庭经济状况、收入水平、家庭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女接受教育质量的好坏,决定其获得社会资源的途径以及得到发展机会的多少。这样的往复循环阻碍了社会流动的畅通性,限制了想凭借自身努力而改变社会地位的群体。故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社会流动机制,让更多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拥有流动的机会和途径,是改善社会公平现状,建设开放型社会的有效路径。

#### [参考文献]

- [1]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2]罗教讲, 涂洪波. 社会成就归因倾向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人口科学, 2004 (6).
- [3] Weiner B. . Intra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Theories of Motivation from an Attributionperspective[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000 (1).
- [4]张翼. 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阶级继承和代内流动[J]. 社会学研究, 2004 (4).

- [5]Judah Matras. Social Inequality,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M]. Prentice - Hall Inc, 1984.
- [6]李强.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J]. 北京社会科学, 2008 (5).
- [7]张翼. 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阶级继承和代内流动[J]. 社会学研究, 2004 (4).

#### [参考书目]

- [1]杜林致. 归因与文化[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2]金耀基. 从传统到现代[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3]Heider F. .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M]. New York: Wiley Press, 1958.
- [4]Weiner B. An Attributional Theory of Motivation and Emotion [M].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1986.
- [5]邓燕. 从国内外的理论研究看亲社会行为归因[J]. 四川心理科学(成都), 1997 (1).
- [6]付建斌, 焦书兰. 群体间归因偏差研究述评[J]. 社会心理研究, 1998 (2).
- [7]景怀斌. 中国人成就动机性别差异研究[J]. 心理科学, 1995 (2).
- [8]李春玲. 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3).
- [9]刘世奎. 归因理论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J]. 社会学研究, 1991 (5).
- [10] Benjamin R. ,etc. . Attributions in Marriage: State or Trait? A Growth Curve Analysi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0 (2).
- [11] Daniel L. W. , Michael P. S. . Controllabil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Self - Serving Attributions of Sport Spectators [J].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0 (2).
- [12] David de Cremer. Effect of Group Identification on the Use of Attributions [J].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0 (2).
- [13] Hubert J. M. Hermans ,etc. Moving Culture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8 (10).
- [14] Jack Martin , Jeff Sugarman. Between the Modern and the Postmodern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4).
- [15] Harry C. Triandis. Culture and Conflic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0 (2).
- [16] Joseph A. ,etc. . Pattern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9 (2).
- [17] Joshua Susskind , etc. . Perceiving Individuals and Groups: Expectancies, Dispositional Inferences, and Causal Attribution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9 (2).

(责任编辑 屈虹)